

# 纵论魏晋南北朝邺城的中心地位

刘志玲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 曹魏至北朝时期, 邺城基本保持着北方中心城市地位。北周末年, 邺城毁废, 其历史地位亦急转直下。本文分阶段考察影响邺城发展的各种因素, 分析邺城中心地位的形成与丧失、邺城自身兴亡的历史, 并由邺城个案获得影响我国古代城市兴衰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 魏晋; 北朝; 邺城; 中心

**中图分类号:** K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08)04-0027-06

**收稿日期:** 2008-09-03

**作者简介:** 刘志玲(1973—), 女, 河北定州人,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邺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是北方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自谭其骧先生提出将其列为七大古都之一, 并在 1988 年中国古都学会第六次年会上正式通过后, 史学界对于邺都的研究日渐深入。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展, 邺城城市建设成为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另外从地理环境、封建割据角度研究邺城兴衰的原因、讨论邺城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的论著也有上百篇之多。<sup>①</sup>本文将分阶段考察影响邺城发展的各种因素, 从邺城中心地位的形成与丧失及城市本身的兴亡, 探讨邺城个案背后城市兴衰的启示。

## 一、邺城历史概述

邺城遗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 位于县城西南 20 公里, 南距安阳市区 18 公里, 现今的漳河横贯其间。<sup>[1]</sup>邺城的兴建可追溯至春秋早期。《管子·小匡》载, 齐桓公“筑五鹿、中牟、邺、盖、牡丘, 以卫诸夏之地”。邺最初是作为保卫中原小国、抵御山戎、狄人的军事堡垒而修建的。春秋时归晋, 属东阳地。战国初邺城属魏, 魏文侯封西门豹为邺令, 治理邺地, 魏国河内得以安定。公元前 239 年赵取邺, 但三年之后, 秦将桓齮出兵攻取河间六城与邺、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 上党郡至河间之间的地区都成为秦国领土, 邺地也在其中。<sup>[2][231]·1831</sup>公元前 228 年, 邺属秦国邯郸郡。西汉属魏郡, 成为郡治所。东汉末年, 上

升至冀州治所。曹魏受封魏公、魏王, 邺成为魏国王都。邺城自春秋初建直至东汉末年, 历经八百余年, 由一个小小的军事堡垒转为一个普通县, 西汉时上升至郡治所, 东汉末为州治所, 继而成为曹魏邺都, 正式确立了邺城作为北方地区中心城市地位。<sup>①</sup>

自曹魏开始至北朝, 邺城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北方中心城市地位。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 曹丕称帝后, 虽徙都洛阳, 但仍将邺城视作“王业之本基”,<sup>[3]941</sup>邺成为五都中的北都。曹氏父子的着力营建, 使邺都的格局、规模基本确立。西晋统一全国后, 虽然国都在洛阳, 邺城仅为魏郡治所, 但在洛都、长安长期动乱的过程中, 邺一度成为西晋王朝的实际权力中心, 其北方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更加明显。

西晋短期统一结束后, 北方进入十六国北朝时期, 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各代, 均先后以邺城为都, 邺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城市发展至鼎盛。但 577 年, 北周灭齐后, 邺由国都下降为相州治所。北周孝静帝大象二年(580 年), 平定相州刺史尉迟迥之乱后, 杨坚下令毁废邺城, 迁相州治所于安阳, 改安阳名邺, 原邺县更名为灵芝县, 至隋开皇十年(590 年)改回,<sup>[4]847</sup>原邺都所在的邺城自此不复存在。北周后期, 虽重建邺城, 但它又回复到了最初县级政区的地位。

① 以高敏《略论邺城的历史地位与封建割据的关系》(《中州学刊》1989 年第 3 期)、邹逸麟《试论邺都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在古都史上的地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 年第 1 期)两文为代表。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改魏州为邺都,后晋、后汉沿用,<sup>[5]720</sup>但此邺都地望在今河北大名。除了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邺都”这个名称外,五代邺都与魏晋南北朝的邺都了无关系。

## 二、汉末战乱割据与邺城的兴起

两汉时期,北方主要中心城市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发生了较大变化。《史记·货殖列传》所记十八个都会城市中,有九个地处黄河流域,邯郸、临淄等是在国都长安之外首列的几个城市。王莽实行统治商业的政策,选定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置五均司市官,洛阳、邯郸、临淄成为北方商业统治的中心,事实上也肯定了它们在全国特别是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中的带头作用。不过,“五都”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与其经济地位并不完全相等。特别是临淄、邯郸,作为黄河下游河北地区的两个中心,其政治、经济地位演至东汉则日趋衰微。<sup>①</sup>东汉后期,北方中心城市的衰落为新兴城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前,张角的得力助手大方马元义在荆、扬一带,组织了群众数万人,计划在冀州魏郡治邺城集合,配合张角主力军同日起义。冀州是黄巾起义的核心地区,起义发起人张角就在这里负责统帅指挥,而邺城被选定为起义首誓的核心城市,从军事意义上来看,邺城地位已经提升。皇甫嵩镇压河北黄巾有功,领冀州牧。鉴于冀州残破,“嵩奏请冀州一年田租,以赡饥民,帝从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sup>[6]2302</sup>不过,在皇甫嵩任冀州刺史的第二年,由于边章、韩遂在陇右作乱,威胁关中,嵩被征召回镇长安。尽管嵩在冀州时间不长,但为战乱中冀州经济的复苏做出了一定贡献。

190年,冀州刺史韩馥上任伊始,与曹操、袁绍等十余人,各兴义兵,同盟讨伐董卓。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屯驻河内,韩馥驻邺城,<sup>[6]2375</sup>邺城成为冀州的中心。在北方冀、并、青、幽诸州中,冀州不仅经济“强实”,而且“带甲十万,谷支十年”,<sup>[6]2378</sup>是据以割据自立的良好场所。为占领冀州,讨卓盟军主帅、勃海太守袁绍,密约公孙瓒南下,胁迫韩馥出让冀州。袁绍不费吹灰之力,占领冀州并成为冀州牧。经过与幽州刺史公孙瓒、黑山黄巾、张杨等力量的多次争战,至兴平二年(195年),袁绍“州城粗定,兵强士附”,其奋武将军沮授提出谏议,“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邺已成为袁绍割据政权的预定国都。建安元年(196年),

曹操迎汉献帝至许,许都成为象征性的全国政治中心。同年,袁绍封邺侯,兼督冀、青、幽、并四州,邺城成为四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sup>①</sup>

官渡之战后,曹操挥师北上,建安九年(204年),攻占邺城,由许都移镇邺城,任丞相兼冀州牧。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封魏公,以邺为都,并将并州归属冀州,<sup>②</sup>冀州辖境扩至32郡国,成为当时北方各州中户口最多的一州。<sup>③</sup>215年,曹操封魏王,邺升为王都。此时曹魏已控制北方绝大部分地区,邺城取代原来的洛阳、长安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汉末长期战乱,地方割据势力不断发展,冀州凭借其经济、交通优势,成为割据者争夺的首选地域。冀州州治邺城,最终以王都的形式确立了其北方城市的中心地位。

## 三、曹魏都城建设与邺城的兴盛

曹操定都邺城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邺地经济。

首先,扩大以邺城为中心的王畿范围。邺本系魏郡治所。魏郡地域早在建安十七年(212年)就已得到扩展,“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钜鹿之廙陶、曲周、南和、(广平之)广平、任(城),赵国之襄国、邯郸、易阳”<sup>④</sup>十五县都被割让给魏郡。建安九年曹操就已移镇邺城并任冀州牧。可以说建安十七年的这次割地,实际上是在为曹操以邺为都奠定基础。至此魏郡共辖县30,成为冀州境内面积最大的一郡。这样以邺都为中心的半径,西至河南中西部,东抵鲁西北,西南包有淇水流域,南达于河。方圆数百公里的土地,都在王畿范围之内,魏郡的行政

① 侯仁之先生在《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中指出:“自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一直到西汉前期,正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升的时期,这时临淄城在全国来说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和洛阳、邯郸、宛、成都,并称为汉的“五都”,并非偶然。从西汉末年起,临淄城开始走上衰落的道路。”(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 《三国志》卷一五《魏志·梁习传》载:“并土新附,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建安十八年,州并属冀州,再拜议郎、西部都督从事,统属冀州……文帝践阼,复置并州,复为刺史……政治常为天下最。”

③ 《三国志》卷一二《魏志·崔琰传》载:“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三国志》卷二五《魏志·辛毗传》载:“(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郡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三国志》卷一六《魏志·杜畿传附子恕传》载杜恕上疏魏明帝,指出当时魏有十州之地,而“冀州户口最多”。由以上曹魏三个不同时期的人口资料来看,冀州户口在曹操封魏公前,当在北方各州中位列前茅。并州并入冀州后,冀州户口位居各州第一,当无疑议。

④ 见范晔《续汉书》志一九《郡国二》裴注引《魏志》。整理者校勘记云:“钱大昭谓阙本无‘广平之’三字,据建武十三年省广平国入钜鹿,则不得云‘广平之广平’,今据删。又《集解》引马与龙说,谓谢锺英云任城属东平,任县属巨鹿。志衍‘城’字。今据删。”《三国志》卷一《魏志·武帝纪》中无“广平”县,且“任”县记作“广平郡之任”。只是整理者未对《续汉书·郡国二》裴注引《魏志》的内容作任何说明。

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其次，充实邺都人口。建安九年，曹操围攻邺城时，“城中饿死者过半”，<sup>[7]25、202</sup>为了充实邺都人口，曹操鼓励向邺都移民。文献记载较大规模向邺都移民的就有三次：

建安年间，并州刺史梁习先后将入居的匈奴人数万徙送至邺。<sup>[7]469</sup>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征服汉中张鲁政权，“徙民诣邺”。<sup>[7]365</sup>

杜袭跟随曹操至汉中讨伐张鲁，后拜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sup>[7]666</sup>

除以上几次较大规模主动或被动向政治中心移民外，曹操部下多举家居邺，性质有如质子。如：右北平无终人田畴，原为袁尚部属，从曹操后，“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邺”。<sup>[7]343</sup>李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sup>[7]534</sup>受到曹操的赞扬。曹操破袁谭于南皮，臧霸“求遣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诣邺”。<sup>[7]537</sup>另外，曹魏制度凡是边郡郡守均须进任子，而任子多居邺城。<sup>[7]693</sup>以上措施使得曹操时代“邺县甚大，一乡万数千户”。<sup>[8]283</sup>至曹丕即位，邺都内外居民多达数万户，<sup>①</sup>仅以二三万户计算，一户人均五口，邺城内外就有上十万人。据考古实测，曹魏邺北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2400 米，南北宽 1700 米，<sup>[9]</sup>约四平方公里，邺城人口密度几可与今日繁华都市媲美。邺都无疑是当时北中国的第一都会，而此时的洛阳城久历战火尚未恢复。

第三，发展邺都的水陆交通。邺城处于太行山东麓原南北要道上，陆路交通发达。汉末战乱割据，陆路运输不仅易受阻且运资昂贵，水运则相对廉价便利。建安九年，曹操率军渡河后，为便利粮草运输，攻占邺城，下令“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sup>[7]25</sup>建安十八年，凿利漕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sup>[7]42</sup>开通了自河直达邺城的水路交通线。从邺城顺漳水北上至河间、勃海郡境，再经曹操为征伐乌丸、袁尚开凿的平虏渠、泉州渠，可直抵河北平原北端的滦河下游；向南经白沟入黄河后，再经建安七年开凿的睢阳渠，<sup>[7]23</sup>可顺流入淮。邺城成为黄淮平原上南北水利交通的枢纽。

第四，营建邺都、繁荣城市经济。建安九年，曹操占领邺城后，邺就成为汉廷事实上的都城。在数次征战后，曹操均回邺城休整。建安十八年，邺成为魏国国都后。曹操“修其郭郭，缮其城隍……建社稷，作清庙。筑曾宫以回阨，比冈隰而无陂。造文昌之广殿……驰道

周屈于果下，延阁胤宇以经营，飞陛方輦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设官分职，营处署居，夹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闾。”<sup>[10]98-102</sup>城内社稷宗庙、宫观台阁、里闾市肆一应俱全。邺城不仅是曹魏政府、宗庙所在，而且是高官显贵、富商大贾们的聚居之地。

城内贵族锦衣玉食，加之都城交通便利，更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晋人左思描述邺城的商业说：“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阊阖以襟带……百隧毂击，连轸万贯，冯轼捶马，袖幕纷半。壹八方而混同，极风采之异观。”<sup>[10]102-103</sup>城内有早、中、晚三市，各市场中店铺林立，道路平坦且四通八达，货赂山积，车毂相击，摩肩接踵，市场交易之盛，规模之大，跃然纸上。市内四方百货有“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湏千日。淇洹之笋，信都之枣。雍丘之粱，清流之稻。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纡房子，缣总清河。若此之属，繁富夥徇，非可单究”。<sup>[10]107</sup>城市建设、人口成分、物产来源，均显示出邺都所代表的当时北中国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sup>①</sup>

220 年曹丕即帝位，迁都洛阳，但魏帝神主直至 229 年才由邺迁至洛阳。关于五都的地位，清儒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其实长安久不为都，谁特因是太祖故乡，聊目为都，皆非都也。真为都者，许、洛、邺三处耳。”<sup>[11]卷 40“许洛邺三部”条</sup>从经济实力、交通状况、文化因素来看，许都地位皆不及邺都。曹魏迁都后至西晋灭亡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邺城保持着河北第一大都市、中心城市地位。

#### 四、十六国时期邺都的持续发展

西晋统一后，洛阳成为全国政治商业中心，长安也开始恢复发展起来。但惠帝永平元年（291 年）开始的“八王之乱”，历时 16 年，洛阳、长安又一次成为战乱的中心。303 年九月，河间王司马颙部将张方率军入洛阳，“烧清明、开阳二门，死者万计”。<sup>[12]101</sup>次年，张方劫持惠帝至长安时，“帝令方具车载宫人宝物，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魏晋已来之积，扫地无遗矣”。<sup>[12]103</sup>永嘉五年，刘曜、王弥等攻下洛阳，焚烧宫庙，杀王公以下三万余人，俘获晋怀帝。直至北魏统一中原时，洛阳城依然“城阙萧条，野无烟火”，<sup>[13]736</sup>破败不堪。

关中长安的破坏不亚于国都洛阳。刘曜攻破洛阳后派子刘粲进掠长安，长安遗人四千余家奔汉中。后刘曜又驱掠关中男女八万余口，退往平阳，当时关中诸郡，“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sup>[12]1652</sup>316 年，刘

① 《三国志》卷一五《魏志·贾逵传》载：“文帝即王位，以邺县户数万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为邺令。”

曜再度攻入关中，围困长安，城中食尽，“人相食，死者太半”。<sup>[12]130</sup>十六国时期，虽先后有前赵、前秦、后秦以长安为国都，但长安也仅是关中的中心城市。

洛阳、长安遭受破坏的同时，邺城却一直保持着上升的势头，遭受的破坏较小。西晋时邺城为魏郡治所，并为河北军事重镇。八王之乱时，成都王司马颖据邺，他担任丞相后，“悬执朝政，事无巨细，皆就邺咨之。”“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舆服御皆迁于邺”。<sup>[12]1617</sup>邺成为战乱中西晋王朝的权力中心。304年，西晋讨伐司马颖的军队战败，惠帝被俘至邺。这期间，邺城虽然一度被马牧帅汲桑攻陷，并“烧邺宫，火旬日不灭”。<sup>[12]117</sup>但三个月后，汲桑就被抚军将军苟晞打败，邺宫虽毁，但邺城依然是西晋控制河北的政治和军事要地。

建立后赵的石勒，在刘渊建立的汉政权中以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的身份驻扎襄国（今河北邢台）。刘曜建立前赵后，封石勒为赵王，仍令其据守襄国，赵实际上一分为二。<sup>[14]</sup>虽然在后来擒刘曜、得关陇事件中襄国功不可没，但石勒占据襄国、建都襄国，均是在攻取邺城难度较大的情况下作出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因此在他登上帝位后，就“自襄国都临漳”，<sup>[12]2746</sup>并下令营建邺宫。可惜，未及迁都，石勒先卒，其侄石虎最终实现了他的宿愿。这也说明十六国时期邺都的地位远在襄国之上。

石勒和石虎对邺城的营建，带来了邺城的第二次大发展。石虎建立的邺都，基本是在曹魏旧城基础上的重建，他首次将高大的城门饰以砖石，城墙上每隔百步建一箭楼。全城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远远望去，“巍若仙居”。邺城南墙最西边的凤阳门，因门高25丈，门巅安有两大金凤，高一丈六尺，高大的城门，配以朱柱白壁，离城六七里即可望见，成为后赵邺城的象征。

石虎死后，其养孙冉闵夺取政权，于350年自立为帝，建立冉魏。两年后，鲜卑贵族慕容儁灭掉冉魏，占领邺城。357年慕容儁将国都“自蓟城迁于邺，赦其境内，缮修宫殿，复铜雀台”。<sup>[12]2838</sup>直至370年，前秦王苻坚率军至邺，生擒慕容儁之子暕，前燕灭亡。十六国时期，前燕、冉魏、后赵定都邺城的时间共计30年。

关于十六国时期邺城经济的发展，史籍缺乏完整的记载。东晋陆翹《邺中记》中记载了石虎统治时期邺城的部分手工业发展状况，“御府中巧工作锦，织成署皆数百人”，织锦署中“有大登高、小登高……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或青绀、或白绀、或黄绀、或

绿绀、或紫绀、或蜀绀”<sup>[15]</sup>等二十余种锦，堪与蜀锦相比。体现后赵邺城手工业发展水平的还有一种工艺品——云母五明金箔莫难扇。它用纯金锻打，薄如蝉翼，二面彩漆画以奇鸟异兽，跟随扇子的大小将云母贴在其中，用细缕缝合，虽然掩盖了图画但色彩依然明微。这些虽只是邺城生产手工业品的一小部分，但却显示了邺城手工业的发达，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邺城经济的繁盛。

## 五、东魏、北齐邺城的鼎盛与毁灭

北朝时期的邺城，依然保持了北方中心城市中的地位。史称“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sup>[16]</sup>“邺洛市廛，收擅其利”。<sup>[13]1473</sup>曹魏时期开辟的邺城水路交通线至此仍保持畅通，稳定的社会环境使邺地经济继续发展，邺城仍然保持着河北平原重要都会的地位。只是孝文帝迁都后，洛阳获得发展，重新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邺城繁盛的程度不及洛阳。

北魏孝昌以后，政治日益腐败，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各族人民大起义不断，北魏一分为二。在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相争的年代里，黄河流域又一次陷入动乱和破坏之中，“征伐不息，百姓疲敝”，<sup>[4]643</sup>“郡国荒残，农商废业”。<sup>[17]244</sup>534年，高欢挟孝静帝北迁，不仅将洛阳城内外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全部迁徙，而且下令拆除洛阳宫殿，将建筑材料运往邺城，这还仅仅是北朝洛阳衰败的开始。东、西二魏对洛阳的争夺战，使刚获恢复的洛阳城再遭战火。538年，东魏大将侯景进攻西魏占领的洛阳金墉城，“悉烧洛阳内外官寺民居，存者十二三”。<sup>[18]4893</sup>之后洛阳在东、西魏之间互有失守，洛阳城几经兵燹，破败不堪。北齐、北周对峙时期，洛阳成为北齐的前沿阵地，战事更加频繁。547年，杨街之因行役重览洛阳，看到的是“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sup>[19]12</sup>洛阳经济陷于停滞状态。

东魏、北齐是邺城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邺城的发展达到了鼎盛。534年，东魏东迁邺城，将邺城所在的相州改为司州，改魏郡为魏尹，并将魏郡、林虑、广平、阳平、顿丘、汲郡、黎阳、东郡、濮阳、清河、广宗等郡划为皇畿。<sup>①</sup>“于城东置临漳县，城西

① 见《北史》卷五《孝静帝纪》。另《魏书》、《河朔访古记》同记此事，但所载各郡名称与《北史》稍有差异。《魏书》卷一二《静帝纪》载“以魏郡、林虑、广平、阳平、汲郡、黎阳、东濮阳、清河、广宗等郡为皇畿”。《河朔访古记》卷中“魏郡部鄆南城”条记作：“以魏郡、林虑、广平、阳平、汲郡、黎阳、东濮、清河、广宗等为皇畿”。考诸史籍，应以《北史》所记为确。

置邺县，城东北置成安县。临漳三百乡，邺县五百乡，成安二百五十乡”<sup>[20]</sup>卷中“魏郡邺城南城”条作为都城区。邺都的城市规模与后赵相比大大扩展。

高欢挟孝静帝至邺之初，居住在曹魏始建的邺北城。当时随静帝北徙的军民有40多万户，为容纳新迁之人，高欢下令将邺城原居民向西迁徙百里，但城内仍然存在人多城狭的问题。于是高欢令散骑常侍李兴业“披图案记，考定是非，参古杂今，折中为制”，<sup>[13]1862·[21]2722</sup>准备营建邺南城。静帝天平二年（535年）八月，征发七万六千人营建新宫（即邺南城），至元象元年（538年）九月，再次征发畿内十万人建邺，历时四十天。自新宫始建至静帝移居南城，历时四年。新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沿城周二十五里筑有长堤防水、并开凿人工漕渠引水环流城郭。据考古实测，邺南城最宽处南北长约3460米，东西宽约2800米，<sup>[22]</sup>其规模远远超过前朝所建的北城。城内除皇宫外，还有四百余坊百姓居所，东、西二市、太庙、大司马府邸、御史台、尚书省及卿寺百司、自令仆以下至二十八曹等诸多衙门。

北齐建立后，邺都更获崇修，其宫室台榭、楼阁观堂、园囿苑城规模，均超过曹魏、石赵。佛教的兴盛，又使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内外佛寺遍布。仅邺城内就有妙胜寺、雀离佛院、大慈寺、大兴圣寺、妙福寺、太原公文寺、文寺等名寺院，邺城成为北齐佛教的中心。邺城周围也有许多寺院，如修宁寺、陆居士寺等，至今仍颇有盛名、位于滏水上源的响堂山石窟就始建于北齐。

东魏、北齐邺南城的营建和邺城的不断经营，使邺城达到了它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从其城市文化来看，形成了与曹魏时期迥然不同的城市风格。曹操初建邺都，逐渐在此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唐代诗人陈子昂称誉的“建安风骨”，恰当地概括了建安时期诗歌的社会内容和它苍凉的风格。曹操的名作《碣石篇》就表达了他雄放豪迈的气概，求贤若渴、藉以成就统一大业的心情。这此都使邺都呈现出一种勃勃向上的城市精神。

演至十六国、北朝，特别是东魏、北齐，随邺城建设规模的扩大，统治者奢侈腐化，邺城的文化风貌也渐至浮华奢靡。邺都文化特点的这一变化，除与统治者个人的性格因素相关外，还应与这一时期邺都上层人物的族属及人口成分的变化相关。建安年间，虽有大量匈奴人被迁至邺，但他们地位不高且未能对邺都以汉人为主体的结构构成多大影响。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赵，是

以胡人为主体的政权。虽然胡人主要集中在当时的国都襄国，但石勒之子石弘镇守的邺城，“以骁骑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以辅之”，说明邺城内也有许多胡人。349年冉闵之乱，“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sup>[17]2791-2792</sup>邺城的胡人竟多达二十余万，那么我们说邺城是以胡人为主的城市就不为过了。前燕慕容儁自蓟迁都邺，必定也随迁不少鲜卑人至此。<sup>[23]</sup>东魏、北齐时邺都城内通行双语，反映胡汉文化融合的同时，也表明分裂时期邺城民族成分的复杂性。胡人为主的政权和城市，使得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邺都“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sup>[4]860</sup>城市建造追求规模宏大，生活尽求安逸，奢侈品务求精美，再没有曹魏邺都蓬勃向上的文化风气，这也使邺城文化颇受后来者诟病<sup>[24]</sup>

577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下令拆毁邺城宫殿等建筑。580年，北周相州总管尉迟迥为反对杨坚篡政，据邺起兵，杨坚派兵镇压，“相州平。移相州于安阳，其邺城邑居皆毁废之”。<sup>[17]133-134</sup>这样，一代北方名都与商业中心，留下的就只有荒凉残破的一片废墟了。

## 六、魏晋北朝邺城兴衰的几点启示

纵观邺城在魏晋北朝时期的兴衰过程，可以看出邺城的兴起首先同冀州部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邺城由普通县上升为郡治、州治乃至国都，又与割据混战的政治局势直接相关，北方其它中心城市的衰落也为邺城的兴起提供了外在条件。从邺城中心地位形成与丧失的过程，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战乱、地方割据等军事、政治因素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兴衰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邺城是一座典型的在战乱割据中兴起的城市，一旦实现南北统一，历史上不再有任何一个政权将邺城作为政治中心，即使它在军事、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依然存在。就是实现了北方统一的曹魏（此指曹丕称帝后）和北魏政权，他们也将国都迁往了洛阳（这除了都于洛阳更便于指挥对南方政权作战、实现统一外，恐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洛阳在政治文化上的象征意义）。邺城正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取得并持续了其北方中心城市的地位。

第二，水陆交通线的开辟和畅通，直接影响着城市中心地位的形成和巩固。

曹操攻占邺城前，就已经开凿白沟、利漕渠，开辟

了自黄河直达邳城的水运航道。攻占邳后，向南北两个方向的拓展，使以邳城为中心的航运线不断延长。这些渠道究竟流通了多长时间，据史念海先生的研究，东晋中叶时的白沟和利漕渠还应该处于安流状态。<sup>[25]148</sup>平虏渠直至北魏时期也仍能安流。北魏时期，将军李阿难曾开凿阿难渠以沟通白沟和漳水，更方便了邳城地区的漕运。<sup>[26]432</sup>东魏天平二年（535 年），改建引漳灌渠为万金渠（又名天平渠），把战国时期的十二渠口改为一个渠口，渠东向东流约三十里，进入邳城。万金渠是邳城城市供水、灌溉和水能利用的综合开发渠道。以上沟渠的开凿和畅通，为邳城通往各地提供了保障，也便利了各地手工业品、商品运达此地，而这些水利设施的开凿，也便利了邳城及其周围地区的农业灌溉，为邳城中心地位的形成和保持提供了经济保障。

第三，浮华奢靡的都市文化对城市的发展极易带来严重的阻碍甚至破坏作用。

由上文曹魏与东魏、北齐邳城文化的对比可以看出，北朝邳城的奢华为其最后的灭亡命运埋下了伏笔。北齐灭亡时，周武帝已下令拆毁邳城宫殿等建筑，至尉迟迥之乱被平定后，杨坚坚决下令彻底毁灭这个前朝的国都，并移民他处，表明了他对这座城市特别的失望。就是这座已被毁弃的城市，到隋朝时仍有“难治”<sup>[27]</sup>的恶名，这不能不说浮华奢靡的城市文化给邳城带来的负面作用有多大了。

参考文献:

[1]徐光冀. 邳城考古的新收获[J]. 文物春秋, 1995 (3).  
[2][西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3][北魏]酈道元注, [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 水经注疏[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4][唐]魏征.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5][北宋]欧阳修. 新五代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6][刘宋]范曄.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7][晋]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8][唐]虞世南. 北堂书钞[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9.  
[9]陈剑. 邳城遗址的勘探发掘与研究——徐光冀研究员学术报告会纪要[J]. 四川文物, 2005 (1).  
[10][梁]萧统编, [唐]李善注. 文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1][清]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7.  
[12][唐]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3][北齐]魏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4]高敏. 略论邳城的历史地位与封建割据的关系[J]. 中州学刊, 1989 (3).  
[15][东晋]陆翊撰, 汤球辑. 邳中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6][北宋]乐史. 太平寰宇记[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0.  
[17][唐]令狐德棻. 周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1.  
[18][北宋]司马光著, 胡三省注.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19][北魏]杨街之, 范祥雍校注. 洛阳伽蓝记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20][元]纳新. 河朔访古记[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 351 册地理类游记之属, 总第 593 册.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6.  
[21][唐]李延寿. 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2]陈剑. 邳城遗址的勘探发掘与研究——徐光冀研究员学术报告会纪要[J]. 四川文物, 2005 (1).  
[23]邹逸麟. 试论邳城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在古都史上的地位[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5 (1).  
[24]周一良. 读《邳中记》[J].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3 (4).  
[25]史念海. 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J]. 河山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63.  
[26][唐]李吉甫. 元和郡县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7]朱和平. 隋朝邳城“难治”试析[J]. 中州学刊, 1998 (6).

Research on Ye city’s Central Position during the Wei, Ji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LIU Zhi-ling

(Faculty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bei University, Wuchang, 43006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ei, Ji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Ye city kept the position of the central city in the North basically. However, in the end of Northern Zhou Dynasty, Ye city was destroyed and abandoned, and also its historical position declined rapidly.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Ye city by stages, analyzed the formation and lost of its central position, and researched the history of Ye city’s rise and fall.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Ye city, some enlightenment is achieved which influenced the Chinese ancient cities’ rise and fall.

**Key words:** Wei, Jin Dynasties; Northern Dynasties; Ye City; Center